

#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摘要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43-168页。

摘要节选自：李惠斌：《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宣读的一个由马克思起草的“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共分四个部分。下面分别介绍这四个部分的具体内容。

## 一、第一部分 论述“国防政府”

马克思用了很大的篇幅揭露了国防政府及其成员梯也尔、特罗胥等的可耻历史、叛国行为和残酷镇压巴黎人民的罪恶行径。马克思通过一些公开披露出来的信件和报告等等指出，国防政府的主要成员是一些“无耻的骗子”，他们口头上说“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巴黎总督特罗胥），“决不会出让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外交部长法夫尔）。但是实际上，他们一上台就派梯也尔遍访欧洲各国宫廷，乞求调解。特罗胥在进入市政厅的第一天晚上就公开对其同僚们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想要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将是一件蠢举。”不仅如此，这位巴黎总督还在后来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重复了这些话，得意地向他们说：“事变的发展并没有推翻我的意见。”马克思在揭示了这些已经被公布出来的巴黎总督的投降的话后指出：“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布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真的不仅仅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之流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么9月4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把特罗胥的计划告诉巴黎人民，让他们要么立即投降，要么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无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马克思接着揭露了国防政府的官员在私人信件中公开承认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这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国防政府”，在大敌当前，不是防御普鲁士的进攻，而是把枪口对准巴黎人民，向外敌投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到了1871年1月28日，骗子们终于丢开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极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波拿巴都未敢担当。”马克思的话使这些投降派的无耻嘴脸表露无遗。

马克思还从个人品质方面揭露了“国防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们的丑恶嘴脸。

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逗留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通过拼凑伪造文据，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财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并且由于法庭偏袒他而躲过合法继承人提出的诉讼。正是这个伪造文据的罪犯在9月4日刚一上台就出于同情而立即释放了两个伪造文据的罪犯，其中一个跑到巴黎后又被公社送回了监狱。“而在这个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声喊叫：巴黎正在释放一切囚犯”。这那里是一个什么外交部长，分明是一个流氓加无赖，或者如马克思讲的是一个“逃犯”。

另一个是厄内斯特·皮卡尔。他在帝国时代就曾经钻营内务大臣职位而没有成功，现在则“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这位财政部长有一个弟弟叫阿尔图尔·皮卡尔，曾经因为诈骗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这一点巴黎警察局1867年7月31日的报告中已经记录在案。而这位财政部长居然安排他的这个宝贝弟弟当了由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马克思进一步揭露说，这份财政部的报纸竟然“用官方诺言来误导一般的证券投机商”，而他的弟弟“则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不断来来往往，利用法国军队的惨败发财”。更加可笑的是，“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了公社手里了。”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了巴黎市的市长茹尔·费里。9月4日前他还是一个吃不上饭的穷律师，当了市长后他在巴黎被围期间以市长的身份利用市民的饥饿搜刮了大笔的钱财。马克思痛斥道：“他将来不得不交代他乱政失职之日，就是他受制裁之时。”

在揭露了伪国防政府中的总督、财政部长和巴黎市长之后，马克思的如刀之笔的重点转向了它的首相梯也尔。

马克思在这里为梯也尔的出场准备了一段非常绝妙的话，不能不摘录下来：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现在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则成了部长。”

这是马克思对国防政府几个主要官员人品德行的准确描述：违犯法律的罪犯，背叛巴黎人民而倒向普鲁士政府的叛国者。而梯也尔则是他们的首脑。这个梯也尔是一个最典型的背信弃义、尔反尔的小人。马克思对于梯也尔的一段描写也让人不能不叫绝。马克思写道：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谋得了首相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圣日尔曼奥塞鲁瓦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充当了密探大臣监狱产婆的角色。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针对新闻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的杰作。”

马克思在这里对于梯也尔的揭露只是开了个头。马克思接着历数了梯也尔的其他主要罪状：比如，1840年在他再度出任首相时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设施的计划而“震惊了全法国”，因为这个计划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他的种种随机应变和反复无常；“他在多年从事政治生涯中，从来没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他对财富贪得无厌却憎恨财富的创造者，他第一次当内阁首相时穷得叮当响，而在他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

1840年3月1日在同一国王手下最后一次当首相时，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时他“报以眼泪了事”；“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薪；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面前当做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马克思接着写道：“梯也尔是一个谋划政治小骗局的专家，一个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一个在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在野毫不迟疑地鼓吹革命，掌权时毫不迟疑地把革命投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政治生涯劣迹昭彰，他的私生活同样为人所不齿——甚至在现在，他处在法兰西之苏拉的位置上，仍难免要以自吹自擂之可笑衬托出其所作所为之可恨。”马克思对于这位国防政府首相的揭露和控诉真可谓是淋漓尽致。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揭露了梯也尔利用普鲁士的入侵、通过投降活动被选为法国政府的首相。在这方面，这个“最坏的人成为最佳人选”。用梯也尔自己的话，他自己“一向只依靠三种资源：外敌入侵、内战和无政府状态”，把一个政治投机分子的嘴脸暴露无遗。

## 二、第二部分 论述3月18日事件的经过

梯也尔政府做出解除巴黎的武装的决定。他们制造了一个借口，宣称国民自卫军手中的大炮是属于国家的，必须交还给国家。马克思指出，这些武器是在普军开进巴黎前夕由梯也尔的军队撤退时丢弃并由国民自卫军筹款购置来的，而且在梯也尔政府与普军签订的投降书里已经正式承认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有的财产，没有列入应该缴给普军的属于政府的武器部分之内。所以马克思揭露说这是梯也尔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找的向巴黎开战的借口。梯也尔以收回国家财产的名义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瓦带领一大批警察和几个战斗团去夜袭蒙马特尔高地，试图夺回大炮，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可是他的计划被早有准备的国民自卫军和闻讯赶来的当地群众的包围打破了。这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梯也尔派去的夜袭蒙马特尔高地的波拿巴军官之一勒孔特将军曾先后4次命令第81战斗团的士兵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结果被他的士兵给枪毙了。还有一位将军名叫克莱芒·托马，时任梯也尔政府军的总司令头衔。他在于3月18日的前几天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由他自己一手炮制的“彻底消灭巴黎暴民之精粹”的计划书后，于18日这天晚上到场充当业余密探，也不知何故死在高地上。

3月22日发生了一次所谓“旺多姆广场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的事件。马克思揭露说，这实际上是梯也尔政府蓄意安排的一次挑衅行为。这一天，从富人区里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派头十足的人物，队伍里全是纨绔阔少，一帮流氓胆怯地以和平示威做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国民自卫军巡逻兵或哨兵就抢他们的枪，走出和平街时他们高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的口号，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部。结果国民自卫军一开枪就把他们吓跑了。中央委员会没有理会这些花花公子的和平示威活动。两天后他们又来了一次公开武装示威活动。这一次遭到了国民自卫军的还击，梯也尔带着他的残兵败将窜逃到了巴黎郊区的凡尔赛。

马克思在这里对中央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的行为进行反思，指出：“当梯也尔通过偷袭蒙马特尔已经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不肯把这场内战打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粉碎梯也尔和他的那帮乡绅议员的阴谋。”这个错误的结果导致了梯也尔对国民自卫军和巴黎人民的报复，大批地杀害巴黎的俘虏和放下武器的平民，并通过杀人进行狂欢。

### 三、第三部分 论述巴黎公社的经验

第三部分是《法兰西内战》的重点部分，马克思在这里对巴黎公社及其经验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

谈到公社，马克思首先向人们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用很大篇幅对此展开了论述。

首先，打碎“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马克思指出，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主要内容的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法庭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在历史的进程中，“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马克思高兴地看到，巴黎公社打碎了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即取消了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势力和传统的法官和检察官制度。马克思写道：（一）“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二）“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即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三）“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四）“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五）“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罢免。”

其次，建立各级基层生产者的自治政府。马克思写道：“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也就得让位给生产者自治政府。在公社没有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的十分清楚，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他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因此，马克思说：“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

第三，中央政府履行的职能虽然为数不多，但仍然很重要，由公社的“严格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与此相一致的，“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保证和实现民族统一的办法是“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的、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寄生的赘

瘤”。把上面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

第四，公社真正实现了廉价政府的口号。马克思指出，“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不仅如此，“公社体制把靠社会供养而且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此一举就会把法国的复兴推动起来。”

第五，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真正赘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的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因此，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从上面讲的普选制、负责制和罢免制等等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公社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是典范性的。

第六，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在这里指出，无论是廉价政府还是“真正的共和国”，都不是终极目的，而只是伴生物。而“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最重要的是劳动者阶级的经济上的解放，这是马克思通过巴黎公社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马克思非常严肃地指出：如果没有经济上的解放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这个话说得很重，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常常被我们忽视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结论。马克思解释说：“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的、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

第七，公社能够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马克思在这里指出：公社“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马克思提到了“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的生产”、“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等等。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后来被误解最多的一个重要理论。过去我们把这里的“个人所有制”理解为公有制，理解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在联合模式失效后的今天，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显得十分重要，我们将在第六章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

## 四、第四部分 论述巴黎的抵抗和梯也尔政府的屠城

---

马克思在这一部分控诉了梯也尔屠杀巴黎人民的罪恶行径。从3月18日巴黎人民把梯也尔政府打出巴黎城直到5月18日凡尔赛的国民议会批准向普鲁士投降的条约，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返回，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梯也尔一直都在试图消灭巴黎公社。但是，他的图谋一直难以实现。巴黎公社战士的英雄气概使得梯也尔认识到，单靠他自己的谋略和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击破巴黎的抵抗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希望得到外省的支援。但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他和外省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团和宣言，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气坚决要求同巴黎和解，而和解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规定的各项自由权利，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

在这种情况下，梯也尔先是要他的司法部长杜弗尔通令国家的检察官们把“呼吁和解”当做罪行查办，继而又改变策略，下令在4月30日按照他自己让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镇法在全国进行市镇选举。然而，在全法国35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议员中，联合起来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总共还占不到8000人。在后来的补选中他们更是受到绝对的敌视。这样，正如马克思所说，“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得到他迫切需要的物质力量，而且连最后一点道义力量，即作为这个国家普选权体现者的资格也丧失了。”而且更表现他们彻底失败的是，各市新选出的市议会决定在波多尔召集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新的国民议会，以取代梯也尔扶持的其代表权失效了的国民议会。

马克思介绍这些情况意在说明梯也尔对巴黎公社的镇压是师出无名，得不到法国各方面的支持。相反地，人们普遍地支持巴黎公社，支持以巴黎公社为主要标志的法兰西共和国。但是，梯也尔政权一意孤行，在得到普鲁士政府支持，收编其放回的波拿巴的被俘人员之后，梯也尔用一周的时间对巴黎进行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大屠杀。由于巴黎守城人员被收买，梯也尔的军队得以攻陷巴黎，巴黎公社的成员保卫巴黎的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马克思写道：“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队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马克思对于梯也尔的士兵们“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不分男女老幼的屠杀”、大批地拷打和杀死俘虏、“在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体而感到困难”以及资产阶级的报刊媒体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无情等等给予了愤然地揭露。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过多地表述巴黎人民被杀害的更多的具体情况，因为这些情况和信息人们从各种报刊上都可以了解到。马克思的笔主要用来揭露资产阶级政府的无耻、罪恶及其腐朽性。针对法国与普鲁士的联合行动，马克思写道：“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

马克思在《宣言》的最后谈到了国际工人协会，指出国际工人协会“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争，自然总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不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协会，必须先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虫生活的条件。这样就再次表达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和宗旨。

作为《宣言》的结尾，马克思为他的文件作了点题，对于巴黎的工人或工人的巴黎，他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这是一种点题，更是历史学家的称颂和历史性的肯定。而对于梯也尔之流的刽子手们，马克思的结论是：“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

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这是一种历史的记录，是写在纸上印刷出来的记录，是写于人们心里去的“历史耻辱柱”。烈士名垂千古，刽子手遗臭万年。时间已经过了140年，但是马克思的这个文献将继续流传下去，法国的这些以梯也尔为首的镇压人民正义的历史性的行为的罪犯和刽子手，将永远受到人们唾弃。而这正是马克思的这个《宣言》的力量所在。